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赵树理文学 的叙事模式研究

刘旭·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一辑〕

赵树理文学 的叙事模式研究

刘旭·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模式研究 / 刘旭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0

(赵树理研究文丛. 第1辑)

ISBN 978-7-5378-4461-1

I. ①赵… II. ①刘… III. ①赵树理 (1906~1970)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968号

书 名 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模式研究

著 者 刘 旭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427866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8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61-1

定 价 46.00元

《赵树理研究文丛》编委会

主 任：杜学文 张志仁

成 员：赵魁元 杨占平 傅书华 和 悦

续小强 宋丽云 贾大一

主 编：赵魁元 杨占平

总序

赵魁元 杨占平

赵树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是20世纪大众化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外具有非常广泛的知名度。他所实践与倡导的深入生活、反映现实、为普通人写作的文学态度，曾经影响了几代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赵树理出生在太行山区，虽然没有置身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但也分明受到了时代潮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同样对赵树理年轻的心灵产生了强烈冲击。这让从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影响的赵树理，能以一种民间姿态、“草根”意识来思考问题；而新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关于科学、民主的追求，又使他比一般人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对既有一切的不满。于是，在赵树理身上形成了一种“我即是民”“民即是我”，“民”与“我”一体的思想观念。他企望改变中国现实的努力既是改变普通民众命运的努力，更是改变他自己个人命运的努力。

赵树理几十年深深融入农村社会现实生活中，与广大农民群众休戚与共，自觉地把自已当作农民中的一员。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群众能够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村政策有失误，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农民的甘苦即是他自己的甘苦，农民的冷暖即是他自身的冷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他不像某些知识

分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常常站出来指点江山、布坛论道，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他要用自己回归到民间，回归到农民之中的实际行动，表明一个作家的态度。

赵树理继承“五四”文学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勇于在创作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同时，他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创造了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现代小说样式和艺术语言。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我们说，赵树理的创作，完全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他身处中国图新求变，努力改革落后面貌的十分特殊的时代，在他人生道路和作品中，折射出普通中国人追求幸福理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历程和精神情怀。

今天，文学已经进入21世纪，但赵树理所奉行的做公众的代言人和文学的现实性、人民性、民族性精神，依然有着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值得广大作家、艺术家学习，更值得广大理论家研究。

因此，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在赵树理诞生110周年前夕，隆重推出《赵树理研究文丛》，这是近年来研究赵树理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应当尽到的职责。这套丛书的作者，有供职在各级文联或作家协会的评论家，有大专院校的教授，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赵树理做了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或许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尽相同，但都是对赵树理研究的开掘，都有可取之处。

我们认为，关于赵树理的研究与写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是因研究者的身份和习惯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的；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也能够体现出一些共性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独创性。我们感受到，近年来的赵树理研究，随着研究者对作家资料掌握的丰富多元，也慢慢形成了各自比较明显的观点。作为一种讲求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活动，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已经从过去只懂得同向性思维逐步向逆向性思维转化。同向性思维往往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经历和作品时，只能跟在作家或作品之后做一些浅层次的阐释，比如，说

赵树理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典型人物有什么特点、艺术表现方式是哪种等等，而这些却是作家和读者都大体上明白的事实。然而，逆向性思维则可以充分表达出研究者的独特之处来，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通过

对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进行反经验的批判性思考，得出一些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与众不同却具有创见性的结论来。这种研究用独到的眼光，评判、分析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各种内在的和外部的蕴含成分，对公认的和传统的结论提出怀疑，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正是如此，才体现出研究者的独创性来。

其次是有真情实感。我们常常感到，当今的某些理论家做作家作品研究时，存在着一种浮躁现象，他们从事文学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到某种学位证书或专业职称，很少去发掘课题的深层次意义。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更有研究者本身内在的意图，而这种意图的核心，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真诚的感情。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赵树理研究界，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满怀真情实感在研究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面对一辈子真诚做人、真诚处事的赵树理，面对赵树理决不违心写作的经典作品，研究者们都是用真诚的感情去研究。没有倾情付出的研究者，其文章也只能是精神涣散的体现，枯燥文字的堆积。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具备了真诚的感情，能够体验到赵树理的内心世界，体验到赵树理作品的本真之处，写出的文章不能说篇篇是精品，但都是有见地有思想的作品。

第三是立足现实。应当说，关于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研究的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我们强调现实性，并不是说一定要把赵树理及其作品与当下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进行价值评定，关键是要能用当下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艺术标准去评判赵树理的人生道路和作品，并且能得出独到的看法或结论来，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现实性了。之所以说现实性是最能体现一个赵树理研究者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如果你的研究还停留在以往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种不新鲜的结论，自然是难有多少价值让人们接受

的。由此可见，现实性是研究的灵魂。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秩序向规范化发展，文学逐步回归到了自己的应有位置，文学研究，包括赵树理研究也逐渐从尴尬境地走了出来。眼下，作家的创作显得相对轻松；研究者也随之放松了心态，在解决了自身知识积累和生存问题后，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研究和评论，个性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发挥。应当说，当下的文学研究已经进入比较宽松的环境，对中青年研究者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希望广大有志于赵树理研究的同行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断更新观念，吸取新的研究方法，把赵树理研究推向全新的阶段。

这套《赵树理研究文丛》的出版，得到了山西省委宣传部和晋城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各位作者的真诚配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相关领导和责任编辑做了认真的编校工作，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二〇一五年八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成功范例

序言
赵魁元

2014年元旦刚过，即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刘旭邮来的书稿《赵树理文学的叙事模式研究》。这也是刘旭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赵树理文学的叙事学解读”的成果。我迫不及待打开书稿读了起来。因为我有一个愿望，想在本书出版之前先睹为快。越读越高兴，越看越兴奋。刘旭果然不负众望，在底层文学研究和赵树理文学研究两个方面同时实现了突破。正如刘旭所言：“现在这本书是我从事底层文学研究的第三本专著，也是我迄今较为满意的一本书。这本书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方法上，都突破了我以往的社会思想式的批评方法，以叙事学为支持的文本分析走出了我研究底层文学和赵树理时遭遇的瓶颈，也着实让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减少了不少力不从心的焦虑。”“我认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形式分析与思想分析相结合，一旦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则会产生令人惊讶的效果，有时会推翻研究者之前先验的看法，还有助于研究者发现一些极其有力的论证角度。正是这种方法的应用，我发现了赵树理在文学及思想上的超越之处……”

这些话，确实令我兴奋不已。我之所以对刘旭的研究课题有着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一方面因为我是赵树理研究多年的关注者、热心者和新研究者，迫切地想要了解赵树理研究的国内外动态和新的研究成果，需要向新世纪以来仍然坚持赵树理研究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新加入赵树理研究队伍的新生代学习新知识、新方法、新思路，更为重要的也是为了解开我心中的疑虑。因为赵树理文学自横空出世以来，便一直处于非议和争论之中。

特别是肯定之后的否定，否定之后的再肯定，其差距之大是很难想象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时空的转换，赵树理文学“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纠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当代文学人才群星灿烂，成为历史人物的赵树理离我们越来越远，这一问题还能最终解决吗？历史老人是公平的。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机遇。特殊的国情，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异常艰巨和不平衡，中国的农民农村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至今仍生活在农村的亿万农民和虽然转移到了城市的亿万农民工，在追求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渴望着精神生活的丰富，期盼着新时代产生他们喜欢看、听得懂的赵树理式文学。于是就产生了刘旭和像刘旭一样的人。他们童年时生活在欠发达地区，甚至非常贫困的农村；上学时适逢改革开放，教育发展，有幸进入了大学，但儿时的记忆始终难以忘怀；对文学的爱好，对农民、农村的关怀，知识分子报国忧民的使命让他们最终选择了以创作、研究、繁荣底层文学为己任。于是，他们碰到了莫言，想到了赵树理。一番深入探讨之后，自然是离不开莫言，绕不开赵树理。于是，2006年有了《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这本书；几年后的2013年，又有了《底层叙述：从代言到自我表述》第二本书。之后再再接再厉，终于有了这本更为成功的书。除了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研究方法的成功选择和融会贯通似乎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刘旭觉得速度有点慢，其实一点也不慢。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缺数量吗？不缺。缺的是质量，缺的是原创和创新。

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作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想过多的重复。该书立论新颖，逻辑清晰，视野广阔，资料翔实，论据充分严谨，俨然是一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集成。该书以全视角的方式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可信的，既传统又现代，因回归传统而超越了现代的、因而永恒的赵树理。希望有兴趣的人都去读一下文本吧。

我想说该书的最大亮点就是以叙事学为支持的文本分析。这是赵树理

研究的新思路、新突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我甚至想，是否可以上升到“以叙事学支持的文本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高度来评价。这当然意味着大量范例的积累、总结，理论的提升和跨越。这种范式的确立，质的提升，理论的概括单靠刘旭和刘旭一样的人去完成是有困难的，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中国梦离不开文学梦。我们应该像俄罗斯民族一样大胆学习、引进、借鉴欧洲文学的同时又超越了欧洲文学，从而产生了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夫等大文豪。我们也应该像美国人（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民族）一样，处处是混合优势，不仅制度、文化、科技是混合的，连人种也是混合的。正是这种杂交混合优势、创新优势创造了强势的美国文化。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文学，就是需要虚心地去学习，大胆地去借鉴，勇敢地去创造。大时代、大机遇已经来临了，我们要抓住大机遇。话说得有点远，有点大，还是脚踏实地吧。刘旭的选择、坚持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1980年代之后，许多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进入中国，为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了活力和动力。刘旭是这样，山西年轻的学者白春香女士坚持以叙事学为支持的研究方法同样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评价一位作家作品是否成功，是好还是不好，必须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要细读文本，这恐怕是常识。为什么说赵树理横空出世？因为在极其残酷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作为宣传新闻战士的赵树理，担负着极其繁重的收集新闻、编辑报纸、宣传抗日、揭露和打击敌人，凝聚抗日军民信心的任务。同时，赵树理还在思考着、探讨着如何为抗日军民创作出真正喜闻乐见的作品来。正是在赵树理的不懈努力下，1943年下半年，短短的三个月内，两部经典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相继问世。两部经典作品先于正式发表的手稿在抗日根据地广为传闻，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冷漠视之，不屑一顾，而老百姓和脱了老百姓衣服而成为八路军战士的则欢呼雀跃：竟有这样的书，为我们写而写我们，我们读得听得懂而又十分喜欢的书。书还没有正式出版而老百姓喜欢看的秧歌剧已改编上演了。刚刚才传达了

延安讲话精神的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大章如获至宝，终于发现了符合延安讲话精神的文学作品，立即撰文在《华北文艺》上广为宣传。三年后的1946年，远在大城市的大文豪郭沫若、茅盾，解放区的宣传战线领导人周扬、冯牧分别撰文高度评价赵树理的“创作”与“创造”。正如郭沫若所言：“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性，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1947年，陈荒煤则发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号召。所有这一切，固然有时代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文本的阅读。郭沫若同时看到的还有《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的十二篇作品。郭沫若做了分析、比较和点评，有的作品很喜欢，而早已是国内知名的大作家丁玲写的一篇，郭沫若并不喜欢。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道理和做法，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极“左”年代，不仅做得不好，常常做错了，文学评价常常偏离文本分析。当共产党从农村进入城市，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对赵树理文学的评价为什么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被誉为代表延安讲话精神的方向性作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说成背离甚至反对延安讲话精神的代表呢？在经过历史的反复之后，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不确定甚至反复变化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对赵树理文学的认知和评价。不仅仅是赵树理文学，其他有影响有代表的文学都受此影响和制约，不过赵树理文学更为典型和更有代表性。只有赵树理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作家、文学家才能活跃在文学舞台上，因此赵树理自然而然成为40年代出生，50年代、6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文学青年学习的榜样。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强化和固化，特别是极“左”的极端化，必然表现为政治对赵树理的抛弃，文学评论对赵树理的否定。1962年“铁笔”“圣手”的赞誉和重新肯定，仅仅让赵树理松了一口气，当他准备重新有所作为时，又被卷入了风口浪尖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反思文学和去政治化盛兴时，

一些人又把赵树理同延安讲话捆绑在一起批评，理由是赵树理是在学习了延安讲话之后才写出了《小二黑结婚》。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悲剧。事实上赵树理是在完全不知道延安讲话精神的情况下独自创作出这部经典作品的。延安讲话传达到太行山区时，赵树理已完成了《李有才板话》的创作。出版时赵树理是否修改过已成为谜。这在文艺史学界许多人是早已清楚的，赵树理在不同时期也反复申明过。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延安讲话和《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是与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不谋而合、互相印证的产物，可以说是统帅和战士的心心相印，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之佳话。那些一再地坚持赵树理是学习了延安讲话之后才创作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人，可能太想为毛泽东的讲话寻找一个有力的且成功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了。直到进入新世纪，赵树理研究和其他文学研究一样，越来越客观，越冷静。孟繁华先生指出，对赵树理评价的反复和矛盾是当代文学“犹豫不决”的表现之一，也是寻找“当代文学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或必要的方式”，“因此，多年来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①是评价作家矛盾和犹豫的根本原因。

那么，对赵树理的评价“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没有。因为否定赵树理的人仍旧认为自己手中还有一张王牌。因为赵树理自己一再讲过，自己的作品是要“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谁也不敢否定，政治上起作用就不同了。问题是赵树理心中的“政治”究竟是什么。显然，赵树理心中的政治如果完全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或者和时髦的政治完全一致的话，赵树理还会一再受到否定吗？研究这一问题需要研究者作为一个专门的大课题来研究。但如果回到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的话，这一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董大中先生早已注意到，提出过，但至今在评论界还未引起重视的应该关注的1956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年。我深深

^① 见《文艺报》2012年9月12日。

感觉到，正是1956年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鱼得水、完全正确的赵树理，对于匆匆忙忙进入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不适应，赵树理甚至发出了为什么不把农民当人看的悲叹。1956年以后的赵树理“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1978年孙犁）

当文学评论真正回归到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赵树理文学的“是什么”和“为什么”就能解决吗？还不能。因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有着很大的模糊性。如赵树理文学研究是土还是洋？究竟是传统还是现代，甚至超现代？说赵树理传统，没有异议。从20世纪以来至今，在民间文学和乡土文学视角内，赵树理无论如何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赵树理现代呢？争论就大了。正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性。多年来，在中国呼应竹内好的人似乎不多。

出路在哪里？显然，以叙事学为支持的文本分析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思路和出路。刘旭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坚持着这样的方法，走出了研究的瓶颈，通向了一条有创新意义的路。

把鲁迅、赵树理、莫言联系起来的宏大比较，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甚至可以说，这是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条主轴线。当然，这样的大课题并不是一本书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但刘旭开了这个头。对于历史，对于刘旭本人，并不是偶然的。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是确立无疑的，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确立无疑的。鲁迅的文学思想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重大的课题。赵树理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崇拜，并决心以鲁迅为榜样走大众化的文学道路也是确立无疑的。只是当赵树理带着鲁迅的作品回到家乡读给农民包括自己的父亲听时，农民们不以为然的態度，使得赵树理对“五四”后颇为现代的自己也在追求的欧化写作方法产生了怀疑。想为老百姓写的东西为什么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呢？甘为农民立言的赵树理决心走自己的路，

用农民的语言为农民写作。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1934年赵树理实现了成功的转型。赵树理对鲁迅创立的方向怀疑了没有？没有。相反是坚定无疑的。1941年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时，赵树理在《抗战生活》上撰文纪念鲁迅先生，“根据地已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了，可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得还有限。假如鲁迅先生健在，他看到这样的新社会，说不定已有一部比《阿Q正传》更伟大的作品出世了”，“为了使我们能够有新的杰作出现，大家自然该喊一句‘在创造上学习鲁迅先生’的口号”。赵树理也多次说过自己是颇懂鲁迅先生笔法的。看一看赵树理在负责抗日时期各种副刊时对敌人的无情揭露，就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敌人的心脏，而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则让抗日军民放声大笑，争相传阅。两年后，《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面世了。显然，这是赵树理“在创造上学习鲁迅先生”的结果。

其实把赵树理和鲁迅联系起来研究，在1980年代赵树理文学研究中已得到一定的重视。赵树理对鲁迅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在乡土小说中赵树理与鲁迅写作的不同也是非常明确的。默涵的《从阿Q到福贵》、董大中的《赵树理与鲁迅》则很有代表性。“假如说阿Q是福贵的前身，我想很是恰当的。然而，时代是不会停滞的，我们从阿Q和福贵身上，正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巨大变化。”“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但因为革命的正面敌人是那样顽强，而且特别残酷和狡猾，也由于广大人民长期在封建意识的麻痹下，由蒙昧到觉悟，不能不经过一个悠长的过程，这就是阿Q到福贵的过程。”董大中不仅指出，赵树理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同鲁迅对他多方面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鲁迅是一位“能动地反映”论者。其实，从启蒙到救亡，从鲁迅到赵树理，如何使国民觉醒，能够成为时代的自觉主体，成为他们两人更为本质的现代性情结。鲁迅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地描写农村生活，而且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位作家，他的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已成为他创作中的光辉部分。可惜，纪念鲁迅先生诞辰

130周年的文章中，竟然看不到这一方面的文章，实在是遗憾。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不仅仅是莫言的荣誉，也是中华民族的荣誉。常常以拥有四大名著和曹雪芹而自豪的中国人，又常常为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自责。从鲁迅开始，继而老舍、沈从文，几次的可能性和猜想都没有美梦成真。莫言实现了，莫言突破了。这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大陆上的中国人，国人振奋了。当然毫不奇怪的是，也有些中国人并不高兴。而刘旭兴奋之余，把鲁迅、赵树理、莫言联系起来，以宏大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不偶然。正如书中刘旭所言，1999年他在博士入学考试中，导师王晓明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是谁？”他当即回答是莫言。现在的刘旭则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判断没有错。这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中国作家，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从莫言的整体创作上看，立足于中国乡村是莫言叙事不变的立场，他的写作从不向权力屈服，形成一个更博大的中国乡村叙事世界。”如果分析赵树理和莫言的关系，书中已有若干比较。我想用一两句话来说明他们之间的同与不同：源同而时代不同。源同，不仅仅泛指中国的文化传统，也特指两人的文学源泉。莫言的恩师之一徐怀中为扩建的莫言文学馆写了几句话：“我们不难得知莫言小说世界的源流。家乡风土人性、工匠农巷、神话传说、地方戏剧等等。凡此古来农耕文明的遗风，便是他的能源库存。多年劳动生活积累，以及蕴藏丰富的儿时记忆，任他信手拈来，取之不尽。以高密东北乡那片红高粱地为坐标，莫言测定了他未来的文学走向，他就此明确了他的‘草根’写作立场。矢志不移，坚守至今。”去掉高密东北乡几个字，用来描述赵树理也是非常贴切的。

时代不同。莫言与赵树理所处的时代显然不同了。但是，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莫言童年生活的时代仍然是“饿”字当头。中国相当的农村依然破败，农民依然穷困，而且在精神领域同样没有发生革命的变化。但莫言是幸运的，他已不是鲁迅式的彻底的战斗和批判，也不是赵树理一个人在苦苦摸索。莫言一路走来，遇到了知音和伯乐，更遇到了大开放时代。

有意思的是，否定莫言和否定赵树理的人一样，都说他们二人不是一流作家。我很奇怪。诺贝尔文学奖能授给一个不是一流作家的中国人吗？代表中国解放区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方向性作家赵树理会不是一流作家呢？明明感觉到一个作家的复杂，却非要归于一个简单的表面现象，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又是什么呢？如果用“理想读者”和“现实读者”之多少来判定作品的好坏，这些人又会说什么呢？当结论明显偏离事实，且多次反复时，是不是评价的标准和概念出了问题？正在阅读刘旭文本的时候，《新华文摘》2014年第二期发表了北大中文系贺桂梅老师的文章——《超越“现代性”视野：赵树理文学评论史反思》，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许多看法，与刘旭的研究可以说异曲同工之妙。贺桂梅老师明确提出，就赵树理文学的评价而言，两种不同的评价尺度都能在赵树理文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又同时感到不足，那么就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即赵树理文学可能根本就处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得以出现并寄生其中的现代文学体制的“外面”。“正视赵树理文学评论的暧昧性，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某种程度意味着反观并思考现代中国文学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我们可否想象一种别样的‘现代文学’？”“因此，需要在重新追问‘现代’的‘中国’‘文学’如何被历史地构造这一基本理论的前提下，来重读赵树理文学。”

本书中刘旭大量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叙事学的角度比较了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在与莫言比较前，比较了曹乃谦等作家，题材宏大，视野广阔。但就这一问题而言，在一本书中想完全说明是困难的。几条既平行又交织在一起的评论主线，如果不是大家，驾驭起来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另外，我曾和刘旭探讨过，就文学评论者而言，该书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但对评论界以外的文学爱好者而言，是不是完全看得懂看得明白呢？这并不是苛求，而是让更多的人喜欢阅读这本书并去宣传它，以达到预期受众或扩大理想读者之目的。为此，就需要作者反复地修改、提炼，需要逻辑更加分明，语言更加吸引人，论